

丰厚翻译之“厚”的多维度探析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丰厚翻译这一概念涵义丰富, 与其“厚”的多维度有直接关联, 忽视其多维度对全面、系统地理解这一概念以及进行厚译实践十分不利。本文将丰厚翻译之“厚”分为静态与动态、文内与文外、主观与客观三个维度, 并对各个维度的实质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此外, 丰厚翻译之“厚”有程度上的差别, 因而对厚的多维度进行探索不能绕开其浅向度。基于此, 我们以注释为例对丰厚翻译实践中的“浅”向度做了分析, 发现增量不足、增量偏误和增量冗余是“浅”向度的三种基本表现。

关键词: 丰厚翻译; 厚度; 浅度; 模因论; 注释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又称“厚翻译”、“深度翻译”、“厚译”等)作为一个翻译学研究的术语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 A. Appiah)提出的。根据阿皮亚的界定, “thick translation”是指“通过注释和附注的方式将译文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翻译”(Appiah 2000: 427)。“丰厚翻译”既是文化翻译中所适用的翻译观, 也是一种学术翻译形式, 对跨文化翻译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 2003)指出: “深度翻译是减小跨文化误读和翻译难度的有效方式。”

“丰厚翻译”的概念在进入我国后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阐发, 初期以理论渊源的梳理和批评反思为主, 如段峰(2006)、章艳、胡卫平(2011)、黄小芄(2014)、周领顺、强卉(2016)等; 后发展为对丰厚翻译功能的研究, 如魏家海(2017)、王雪明、杨子(2012)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出现了结合具体文本, 对丰厚翻译的类型、原则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如许宏(2009)、李雁(2014)、王振平(2015)、张广法、文军(2018)等。在进行理论分析时, 学者们往往将丰厚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或翻译观, 指代重视原文语境和作者意图, 充分关注并保留原文中文化差异的做法。而在探讨丰厚翻译的实现路径时, 往往取丰厚翻译的一种具体实践作为分析对象, 如注释。基于不同体裁的文本对其添加的原则、类型、作用进行分析。

以“丰厚翻译”为一种翻译策略, 那么丰厚翻译的实现方法就不仅限于添加注释, 它似乎可以囊括翻译中所有保留源语文化的做法。如李雁(2014)将“深度翻译”方法划分为文本内和文本外两大类, 其中文本内的方法包括仿词(句)、近似翻译、音译、描述性翻译、背景翻译, 文本外的方法则是副文本书写。但这种看法似乎模糊了丰厚翻译与异化策略之间的差别。章艳、胡卫平(2011)认为, 异化与深度翻译在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上是相似的, 但深度翻译除了向读者展示原文的文化信息, 还对它们进行阐释。本文同意这一观点。

从根本上看,丰厚翻译与异化策略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语境之深厚上,所以丰厚翻译之“厚”是这一策略研究的核心所在。

围绕这个“厚”目前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丰厚翻译的“厚”有哪些维度,这关系着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准确把握;其次,丰厚翻译为何得以发生?从翻译实践来看,丰厚翻译似乎完全取决于译者的主观判断,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但这种主观目的背后是否有客观的规律在促使厚译的发生,并使其不断趋向厚?其三,当前不少研究都尝试对丰厚翻译的另一个向度“薄/浅”做分析(如罗威 2016;周领顺,强卉 2016;冯全功,侯小圆 2017),这些尝试中有从翻译方向上做逆向思考的,也有从丰厚翻译之“厚”的薄/浅向度上进行分析的,其中后者对丰厚翻译实践批评而言十分有益,但问题是丰厚翻译本身意味着“增量”,而薄/浅译往往对应的不是增量的不足,而是文化信息本身的略译或省译,所以从本质上说,这并不完全是丰厚翻译本身的批评,也不完全是其“浅”向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丰厚翻译之“厚”的多重维度进行探索,以期得出新的认识。

2 丰厚翻译之“厚”的多重维度

目前学界对丰厚翻译的理解并未达成一致。周领顺、强卉(2016)指出:“‘厚译’不完全属于翻译的范畴。表面上看似面对原文意义的深度解读,实际是面对社会需求的再创策略。”而章艳、胡卫平(2011)则认为“深度翻译”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翻译方法,也可以作为文化翻译研究思路。这些分歧背后的根源之一就是丰厚翻译的“厚”理解不同。事实上,丰厚翻译之“厚”有多个维度,包括静态与动态、文内与文外、主观与客观。揭示丰厚翻译之“厚”的多维度对整体、客观地把握丰厚翻译的概念有积极意义。

2.1 静态与动态

“丰厚翻译”作为一个翻译学术语,其中的“丰厚”与“翻译”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汉语中“翻译”可以是动词,指译者的语言转换行为。此时,“丰厚翻译”是指包括翻译理解在内的尽量保留源语文化信息、注重文化阐释的翻译策略,其方法有添加注释、副文本等。而当“翻译”作名词理解,即翻译活动的结果——译文时,“丰厚翻译”是指文化保留、阐释的结果,即注释、副文本本身。因此,丰厚翻译中的“厚”首先有静态与动态之分。

静态下,丰厚翻译通常表现为文本增量。这很好理解,因为丰厚翻译的概念来自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亦称“厚描”。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指出,“如果说民族志是深描,民族志学者是从事这种描述的人。那么,对于任何一个给出的例子,无论是一小段田野日记,还是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的长篇专著,决定其好坏的问题则是它是否将挤眼与眨眼区分开来,是否将真挤眼与模仿的挤眼区分开来。”(格尔茨 2008: 18—19)从格尔茨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对于人类学者而言,无论是小篇幅的田野日记,还是长篇的专著,只要将细节纳入,做到深入阐释就可称为深描。在这里,阐释的深度与描写所用的篇幅长度、符号量(文字等)并非总是成正比的。而在翻译中,囿于原文的空间有限性和译者在译文中显身的“不合法”性,若想在翻译的基础上做到阐释,译者只能通过文内增添信息或在文外添加副本来实现,它们的外在表现就是文本增量。

文本增量的基本类型有文化信息增量、符号增量和情感增量。文化信息增量是指源语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出现的较之原文更详细、立体的部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即便是再微小的文化因素,也会盘根错节于复杂的文化系统之内。对其时空、互文层面的补充和阐释会改变其在译文中的平面状态,变得像在原文中一样立体。例如:

(1) **四婶**就在八仙桌上摆出一碟凉调的豆腐,一碟油泼的酸菜,还有一碟辣子和盐。(贾平凹,《秦腔》)

译文: Жена его – все звали ее Четвертая тетушка, поскольку Ся Тяньчи был младшим из четырех братьев, – ставила на квадратный «стол восьми бессмертных»

блюдец с холодным доуфу с приправами, блюдец с квашеными овощами в масле, еще было блюдец со жгучим перцем и соль. (Перевод А. Н. Коробовой)

中国人自古就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大家族中兄弟姐妹常按数字来排行，俄语文化中尽管也有以数字来排行的做法，如伊凡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等，但排行通常是为了区分相同的名字，而且多用以称呼历代君主。因此，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此处译者在译文中增加了“四嫂”这一称谓语的文化背景：“大家叫她四婶，因为夏天智在四兄弟中排行第四。”

翻译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源语文本中的符号既有语言符号，也有非语言符号（如标点、图像等），它们都是“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王铭玉 2013：5）。丰厚翻译常常伴随着符号量的增加（主要是语言符号），这也是丰厚翻译给读者带来的直观视觉感受。例如，《尤利西斯》的两个译本的译注数量庞大，萧乾译本中多达 5840 条，金陵的译本中也有 1900 条，这些注释使译本在容量上名副其实地增厚了。林文月（1998：18）曾列举了自己安排注释的五种情况，其中包括：“原著行文过于简略或含蓄隐晦，倘不适度增添笔墨，即无以使读者了解”，所以从译者角度来看，丰厚翻译往往伴随“笔墨”的增添，也就是语言符号量的增加。“据粗略统计，严复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约占全部十部译著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论》的按语数则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方梦之 2004：85）当然，单纯的符号量增加未必能够达到丰厚翻译的效果，但深厚的文化语境是由语言符号构建的，是其物质基础。

除了文化信息和符号增量外，丰厚翻译往往还伴随着情感增量。刘宓庆认为：“文艺作品（其实不限于文艺作品）中蕴含的‘情’（情感）是一个审美范畴，是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活跃而且贯彻始终的因素。”（刘宓庆 2007：127）在解读源语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意随情变”的现象，这变化的背后一般都隐藏着文化差异，因而“情”的文化内涵也是丰厚翻译需要把握和传达的。例如：

(2) — У нас есть русалки, — заметил Берсенеv. — **Поди ты со своими русалками!**
(И. Тургенев, Накануне)

译文：“我们有我们的美人鱼*呀。”别尔森涅夫指出。“**得了吧，你跟你的美人鱼!**”（智量译）

*俄国民间传说的水中仙女，音译为“露莎尔卡”。

例 2 中的“美人鱼”从字面看，深为中国读者熟知。然而，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美人鱼出自丹麦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美丽善良的化身，上例中的美人鱼则明显带有贬义。根据俄语详解大词典（1998：1134）中的注解，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美人鱼生活在河里，一般由溺亡之人化身而成。相传在三圣节过后的一周内，美人鱼会在夜晚上岸，一旦遇到过往行人，就会挠痒使之发笑直至他们力尽而亡或是将他们拖入水中淹死。因此，美人鱼在俄罗斯文化中是恐怖的、冷冰冰的女怪形象。此处译者并未在注释中表现出其反面的情感色彩，反而用了“仙女”一词将其进行了遮蔽，增加了正面的情感色彩。这从侧面反映出丰厚翻译中“厚”的情感维度。

在翻译实践中，“共情”是译者应该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傅雷（1984：695）提倡译者应有“敏感之心灵，热烈之同情”才能做好翻译。林以亮认为，“如果一个译者对原作没有‘同情心’……那么他虽然还没有开始，已经注定了非失败不可。”（林以亮 1984：204）对于丰厚翻译而言，“共情”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因为丰厚翻译的目标是进行深入而细致的阐释，“以承担真正有见识地尊重他者的、更艰巨的任务”（Appiah 2000）。情感体验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文化心理的不同，而这也正是文化误解的根源之一，所以与原作“共情”，通过丰厚翻译深入把握原作文化信息背后的情感差异，并通过注释等方式将其展现出来十分必要。

动态视角下,丰厚翻译可以理解为一种翻译策略。熊兵(2014)认为,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是指“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作为一种策略,丰厚翻译应包含原则和方案两部分,缺乏原则的指导就不会有恰当的方案,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也就无法体现译者所秉承的原则。可以确定的是,丰厚翻译以保留文化差异为原则,那么其方案包括什么?

刘宓庆认为:“文本解读的前提条件是语义的文化诠释,因为后者是理解的基础。”(刘宓庆 2007: 171)我们认为,语义的文化诠释也是丰厚翻译的基础,因为丰厚翻译所要求的深厚的文化语境需要通过语义的文化诠释来构建。语义文化诠释有四条实现途径:1. 文化历史关照;2. 文本内证与文本外证;3. 互文关照;4. 人文互证。通过这四条途径,语义文化诠释“旨在质疑而求证,求证以定义”(刘宓庆 2007: 105)。因此,在文化翻译视域下,语义文化诠释的目的是帮助译者进行语义定夺,确立准确的文化翻译方案。而对于丰厚翻译来说,上述四条途径可以帮助译者在复杂的源语文化系统中定位文化因素,构建文化语境,但其目的并非定名,而是将诠释出的信息增加到译语文本中。所以,丰厚翻译包含但不止于语义文化诠释。

丰厚翻译具有学术性,这一点阿皮亚(2000)早在丰厚翻译提出之初就曾明确过,周领顺、强卉(2016)也曾从译者身份角度肯定过丰厚翻译的学术性。学术性与学者之功最终要通过研究产出来体现。如果缺乏详细的阐释,那么语义文化诠释就只是一种观念活动,无法达到丰厚翻译的目的。因此,除了“研”之外,丰厚翻译还应包含“释”这个步骤,其中“研”是指研究性语义文化诠释,“释”则是指用注释、副文本等方式将阐释出的文化信息保留在译语文本中的做法,它们是丰厚翻译作为翻译策略的具体方案。而定名,要先于丰厚翻译完成。“毕竟,翻译不同于学术研究,总要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选择而在白纸上落墨,否则如何令读者卒读?不过,如果歧说之距离过大,甚或彼此意见相左,则需要附以注文解释才好。”(林文月 1998: 11)由此可见,尽管不定名无以称翻译,但由于翻译方案本身在构建文化语境上的能力有限,因而它并非是丰厚翻译的任务之一。丰厚翻译旨在于定名之外进行阐释,所以无论定名是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下完成的,都不会影响丰厚翻译的进行。

2.2 文内与文外

丰厚翻译“增厚”的空间分为文内和文外两部分,因此我们还可以从文内与文外两个角度来分析其“厚”度。这里的文内指的是译文正文之内,而文外则是译文正文之外。

文内增厚是有限度的,首先文内增厚的空间有限,其次译者进行文内增厚的权限也有限。奈达(E. A. Nida)指出:“译者不能在译文的正文中随意增进解释性材料。在正确的翻译中,译文的扩展有着明显的限度;译文中所能增加的只能是原语中的‘潜台词’。”(转引自谭载喜 1984: 88)也就是说,文内增厚不能超出原文语义的范围,“(1)不能增加原语中并不存在的文化信息;(2)不能增加从原文的其他部分引申出来的信息。”(转引自谭载喜 1984: 88)所以,文内增厚所构建起的文化语境是较窄的。正因如此,文内增厚往往不显痕迹,可以让读者顺利地读下去。

文内增厚的常见做法是增译。增译(добавление)的原因大致可分为语言的限制和文化的限制两类。巴尔胡达罗夫认为:“最常见的加词原因是译文不能在形式上表达原文词组的各个词义成分。”(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 221)与此相对,奈达明确指出:“当原语和译语的所指物之间明显存在着文化形式和作用上的区别时,译者就必须给译文提供一定的上下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增补的上下文可以直接穿插在译文的正文里。”(转引自谭载喜 1984: 86)丰厚翻译要求译者将译文置于深厚的文化语境之中,因而文化增译是文内丰厚翻译的主要表现形式,增厚的方法包括为陌生的文化特有事物加上类别词,如“耶路撒冷城、洗礼”、加上描写性的修饰语,如“(木匠鲁班)门弄斧”、对历史典故进行描写等等。例如:

(3) 赵宏声**猴一样**爬梯子往戏楼两边的柱子上贴对联，对联纸褪色，染得他颧骨都是红的。(贾平凹，《秦腔》)

译文: Чжао Хуншэн ловко,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вскарабкался по стремянке, чтобы наклеить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на обеих колоннах по краям от сцены, бумага надписей полиняла и окрасила в красный его скулы. (Перевод А. Н. Коробовой)

上例中，作者用“猴子”比喻爬梯子的人动作灵巧，而俄读者对这个隐喻背后的文化背景不甚了解。译者采用了增译的方法在文内做了补充：“赵宏声像猴子一样**灵活地**……”。

相比文内增厚，文外增厚的空间限制较小，译者发挥主观性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文外增厚主要是以添加副文本的方式完成的。副文本，简言之，就是指围绕在正文周围的使作品得以呈现的各种伴随形式，它们能够强化和延伸正文 (Genette 1997: 1)。除了注释之外，其它的语言和非语言副文本往往不是针对某一微观文化因素的理解来添加的，这是其开放性的第一个表现。此外，副文本在内容方面也呈现出多元无边的特点，即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纳入副文本的，也没有什么是必须纳入的，这意味着副文本添加在内容上的选择权大部分在译者手中，译者的主观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发挥，由此所构建起的文化语境也更加宏观、开阔。

2.3 主观与客观

丰厚翻译的主体是译者，从主体的角度可将丰厚翻译分为主观增厚和客观增厚。主观增厚是指译者在主观意愿下进行丰厚翻译，而客观增厚则是译者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进行增厚。事实上，主观增厚与客观增厚一直存在于有关注释是否应该添加的争论之中。在我们看来，该不该添加注释所争论的本质问题是翻译中的阐释有无界限？刘宓庆曾举过一个例子，例子里“阳”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被译为“a force derived from the dynamics of the Great Ultimate brought into action (太极动而生阳)”，他进一步指出：“其实，这种‘阐释’问题并没有解决，读者不禁要问：‘太极’又是什么呢？……翻译家的工作就做到这一步了，至于进一步的阐发，那就是哲学家的任务了：翻译家的阐释只是意义转换，哲学家的阐释则是意义论证，各有分工，谁也不必越俎代庖。”(刘宓庆 2007: 254)然而，有关译者的阐释到底是意义转换还是进一步阐发，至今并未达成一致。至少从丰厚翻译的角度来说，似乎译文越“厚”越能促使翻译活动接近“文化传真”的目标，这意味着阐释需要尽可能充分和全面，而充分、全面最终是由译者自己来衡量和把握的：“至于译文究竟要多厚才算是丰厚翻译，必须自己确定。”(张佩瑶 2012: 55)也就是说，丰厚翻译是发乎译者之情，但又难以止于客观之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观和客观维度进行分析，以期找出主观增厚背后的客观规律。

从主观上来说，译者进行丰厚翻译的目的是为达到读者之满意：1) 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今日的读者，不仅以纯粹欣赏的心态读之，更视为学术研究之对象”(林文月 1998: 18)；2) 从而保证译语读者的阅读效果。“从前张谷若先生译哈代 (T. Hardy) 所著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时，用山东方言译英国维塞克 (Wessex) 方言，每处都作注说明。但归根结蒂这样的注是为避免误解而作的，也就是为读者着想的。”(袁可嘉 1984: 91)即便进行丰厚翻译是为了展示译者个人的学识，抑或是通过丰厚翻译来为个人翻译行为进行解释，最终也都是指向“传递文化的最强音”和“文化传真”需要的。

然而，“文化传真”只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目标，丰厚翻译为何会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不断增“厚”？换句话说，译者的主观性背后是否有某种客观因素在左右丰厚翻译行为？我们认为，模因论或可解释这一倾向。

模因 (meme) 这一概念是由道金斯 (Dawkins R.) 于 1976 年在其《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书中假设，也许人类文化中也存在一种类似基因 (gene) 的基本遗传单位一

一模因 (meme), 才使得文化得以继承与传播。在生活中,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模仿, 从学会唱的每一首歌到做出的某个肢体动作, 无不是通过模仿获得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有种东西被复制了。Blackmore 指出, “任何事物, 只要它以这种方式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它就是一个模因。” (布莱克摩尔 2011: 10) 模因无处不在, 只要能够通过模仿而传递的东西, 都可以看作模因。

翻译也是一个模仿的过程, 无论是从“信达雅”的标准来看, 还是从“形似”抑或“神似”来看, 翻译始终要基于对原文的忠实才能确立。因此, 我们可以将翻译看作是一个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被传递的文化因素就是一个个复制因子——模因。模因的传播方式分为两种, 包括“对结果的拷贝”和“对指令信息的拷贝” (布莱克摩尔 2010: 87)。对指令信息的拷贝是指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传播 (memetic genotype); 对结果的拷贝则是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传播 (memetic phenotype)。如, 按照折叠步骤折一只纸船就是基因型传播, 是对指令信息的拷贝; 而根据朋友所折的纸船模仿则是表现型传播, 是对结果的拷贝。道金斯认为, “这样的指令信息……应当具有很高的保真度, 其保真度绝不亚于数字化信息。这是因为, 所有这些指令信息所指称的, 都是一些理想化的操作步骤。” (布莱克摩尔 2010: 8—9) 所谓理想的指令步骤, 是指步骤的最完善程度, 如, 在折叠纸船的步骤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齐”这样的字眼。尽管每个人对“齐”的理解不同, 但对这个完善程度是共知的。

再来看丰厚翻译, 丰厚翻译的目的在于构建深厚的文化语境, 而语境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认知的角度来说, 它通常包括“模式识别、图式激活、知识选择和假设形成四个阶段。” (黄华新, 胡霞 2004) 因此, 丰厚翻译中所添加的注释或副文本在语境建构中起到的实际上是指令信息的作用, 是译者根据译语读者的认知状况所编写的语境构建步骤, 读者读之可自动修正或补充自己的认知步骤。

尽管每个读者由于知识水平、生活经历的不同, 会在构建认知语境时呈现个体差异, 但是译者在进行丰厚翻译时始终有着向可信的普遍知识水平看齐的趋向。这表现在译者添加注释时会广泛查阅资料、进行文化考证, 试图找到最完善的认知语境构建步骤。这种完美性趋向就是丰厚翻译不断增“厚”的本质。所以, 丰厚翻译的实质是一种确保模因复制保真度的基因型传播手段, 译者对丰厚翻译的内容所作的种种拓展也可以看作是为了不断追求操作步骤理想化所作的努力。

3 丰厚翻译之“浅”度分析

我们用“浅”来指代丰厚翻译的另一个向度, 是因为如果从逆向的翻译过程 (即回译) 来看, 的确是一种变“薄”的翻译。但若就丰厚翻译本身的批评来说,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文本增量的问题, 所以用“浅”来相对“厚”更加恰当。对丰厚翻译的“浅”向度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译者们普遍抱有越丰厚越逼真的愿望, 但事实上, 丰厚与“文化传真”二者之间并非线性关系, 误导读者的情况在丰厚翻译实践中时有发生, 连鲁迅先生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他曾错将 Young 注释为出生于 1826 年的德国伤感诗人 (吕叔湘 1984: 61)。而就丰厚翻译之浅对读者的影响, 袁可嘉 (1984: 62) 指出: “一不经心, 译者通过加注很容易将作者的意义全部地或部分地歪曲了, 迷糊了”。所以, 对丰厚翻译之“浅”向度进行分析是优化丰厚翻译实践的必要途径。以注释为例, 丰厚翻译的“浅”向度表现在注出而阐释不足、注出而阐释偏误以及注出而阐释冗余三个方面, 即增量不足、增量偏误和增量冗余。

3.1 增量偏误

增量偏误常见于译者的主观性阐释。金隄 (1996: 1070—1071) 在《尤利西斯》的译后记中指出: “注释内容尽可能限于必要的背景知识, 尽可能避免对理解小说内容和欣赏其艺术无关的考证。”也就是说, 注释要补充的应为文本中的“个案”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而不

是对一般文化背景作补充。例如：

(4) 外曾祖父**双手**接了大洋，跪在地上千恩万谢，直到小黑马跑过铁道，他才爬起来。
(莫言，《红高粱家族》)

译文： Прадедушка **обеими руками*** принял деньги, не вставая с колен, начал рассыпаться в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ях и поднялся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чёрная лошадка уже пересекл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пути. (Перевод Н. В. Власовой)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этикету подарок следует вручать и принимать обеими руками.

在这里译者将“双手”注出，并解释“根据中国人的礼节，礼物应该双手奉上、双手捧接。”然而，此例讲述的是外曾祖父为了家产诬陷亲生女儿，被县长惩罚，后看在曾祖父的女儿是其干女儿的份上才赏了钱财，为的是让其好好生活。此处的钱财是赏，不是赠，带有明显的官民等级色彩。因此，“双手”捧接不是出于对赠予人的礼貌，更多的是出于等级差别对其行为的要求。

文化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同样一个礼节，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情境中含义均有所差别。因而，注释添加应遵循文本中体现出的文化个性，而不应一味寻求文化共性的阐释，否则必然会造成文化理解的错位。

3.2 增量不足

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作为丰厚翻译的对象往往具有多面性，这意味着译者需要做出“阐释什么”的决定。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互文性人名为例，其互文关系和文化内涵是译者决定阐释的方面，但具体是阐释这一人名的出处、性格特点还是事迹则需要译者自己来权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译者不能将丰厚翻译与读者的认知语境建构步骤进行对应则容易出现增量不足的问题。例如：

(5) Господа **печоринской школы** скажут вам, что мы всегда любим тех, которые сами мало способны любить; а мне так кажется, что все матери любя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особенно отсутствующих. (И.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译文：**毕巧林*式**的先生们会对您说，我们老是爱那些自己很少懂得爱的人们；但我却觉得，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爱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黄伟经 译)

*毕巧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上半叶重要作家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年）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毕巧林是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他非常任性且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别人的感情。此处，屠格涅夫是以毕巧林式的先生来类比罗亭，从而揭示他的虚无和自私。但是，此例中译者未能提供引导读者建构认知语境的关键步骤——对“毕巧林”这一人物性格的揭示，因此导致了丰厚翻译增量不足的问题。

3.3 增量冗余

考证详实、内容相关的注释是值得提倡的，特别是在传递文化观念、传播文化价值之时。但有些厚译是“译者以翻译为幌子展示自己学识和研究成果的，学术味道浓厚，具有独创性，间接利己。”（周领顺，强卉 2016）注释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从文化传真的目标来看，并非注释内容越深入、信息越多，源语文化信息在翻译中的保真度就越高。

(6) “该走了啊，**九儿**。”曾外祖母呼着奶奶的乳名说。(莫言，《红高粱家族》)

译文：— Надо ехать, **Девяточка***! — Прабабушка назвала бабушку молочным* именем. (Перевод Н. В. Власовой)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младенец получал, помимо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ещё и

«молочное» имя, причём зачастую специально давали какое-то неблагозвучное, чтобы злые духи не позарились на «ненужного» ребёнка.

例6 向外国读者呈现了中国人的姓名文化,译者用俄语中的小表爱形式将“九儿”直译为“小九”并添加了注释:“在古代中国,婴儿出生时除了大名以外,还会起一个‘乳’名,而且这个乳名通常会故意使用不好听的字眼,为的是能驱邪避魔。”这条注释从内容看并没有错,但是此处的“九儿”并不是类似“狗蛋、二狗”这样的粗俗乳名。相反,中国人以数字“九”为美、为尊,而且九谐音“久”,蕴含着长久美满的期盼。这条注释会使读者产生不恰当的联想,例如,中国人不喜欢数字九,因而以为“九儿”也是一个粗俗的乳名等等。

冗余的注释尽管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很多时候这些信息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特定的语境下,这些冗余的信息会导致译语读者产生错误的文化联想,最终导致文化误解。

4 结束语

研究发现,丰厚翻译之“厚”具有静态与动态、文内与文外、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分别从内涵、方式和主体角度揭示了“丰厚翻译”概念的复杂性。探索丰厚翻译之“厚”的多维度对推动丰厚翻译理论体系化有一定帮助。尽管译者希望通过丰厚翻译尽力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误导读者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对其本体的“浅”向度进行揭示十分必要。丰厚翻译本体的“浅”向度表现在增量不足、增量偏误和增量冗余三个方面,而系统的解决办法和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1]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 [A].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 [2]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 (3).
- [4] Бархударов Л.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 [5] Кузнецов С. А.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оринт, 1998.
- [6] 莫 彦. 红 楼 梦 的 俄 译 本 考 索 [M]. 译 林 出 版 社, 2018.
- [7] 曹 彦. 曹 彦 的 俄 译 本 考 索 [M]. 译 林 出 版 社, 2017.
- [8] 布 莱 克 摩 尔. 谜 米 机 器 (高 中 春、吴 友 军、许 波 译) [M]. 长 春: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2010.
- [9] 道 金 斯. 自 私 的 基 因 (卢 允 中、张 岱 云 译) [M]. 北 京: 科 学 出 版 社, 1981.
- [10] 段 峰. 深 度 描 写、新 历 史 主 义 及 深 度 翻 译——文 化 人 类 学 视 阈 中 的 翻 译 研 究 [J]. 西 华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2006(2).
- [11] 方 梦 之. 译 学 词 典 [Z]. 上 海: 上 海 外 语 教 育 出 版 社, 2004.
- [12] 冯 全 功, 侯 小 圆. 瘦 身 翻 译 之 理 念 与 表 现——以 *Moment in Peking* 的 汉 译 为 例 [J]. 外 语 学 刊, 2017(5).
- [13] 傅 雷. 论 文 学 翻 译 书 [A]. 翻 译 论 集 [C].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
- [14] 格 尔 茨. 文 化 的 解 释 (韩 莉 译) [M]. 南 京: 译 林 出 版 社, 2008.
- [15] 黄 华 新, 胡 霞. 认 知 语 境 的 建 构 性 探 讨 [J]. 现 代 外 语, 2004(3).
- [16] 黄 小 芄. 再 论 深 度 翻 译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J]. 外 语 研 究, 2014(2).
- [17] 李 雁. 《红 楼 梦》法 译 本 的 “深 度 翻 译” 及 其 文 化 传 递 [J].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2014(4).
- [18] 林 文 月. 关 于 古 典 文 学 作 品 翻 译 的 省 思 [A]. 因 难 见 巧: 名 家 翻 译 经 验 谈 [C]. 北 京: 中 国 对 外 翻 译 出 版 公 司, 1998.
- [19] 林 以 亮. 翻 译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A]. 翻 译 研 究 论 文 集 (1949—1983) [C]. 北 京: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1984.

- [20]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 [21]吕叔湘. 翻译工作和“杂学”[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22]罗 威. “薄翻译”——以《荫馥堂——建筑风格与一户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英译中翻译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6.
- [23]乔伊斯. 尤利西斯(下卷)(金隄译)[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24]谭载喜. 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 [25]王铭玉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6]王雪明, 杨 子. 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 中国翻译, 2012(3).
- [27]王振平. 《尤利西斯》汉译注释研究[J]. 外语研究, 2015(3).
- [28]魏家海. 《楚辞》翻译注释的文化功能[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1).
- [29]熊 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3).
- [30]许 宏. 典故翻译的注释原则——以《尤利西斯》的典故注释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1).
- [31]袁可嘉. 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32]张广法, 文 军. 汉语古诗英译注释策略研究[J]. 外国语文, 2018(6).
- [33]张佩瑶. 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 [34]章 艳, 胡卫平. 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翻译的启示——“深度翻译”理论模式探索[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2).
- [35]周领顺, 强 卉. “厚译”究竟有多厚? ——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Thickess” in Thick Translation

Hu Ye-Shu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ick translation is rich in meaning,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thickess”. Igno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thick trans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ick translation. We divide “thickess” into three dimensions: static and dynamic, in-text and out-of-text, subjective and perspective, and analyze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imension. Furthermo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thickess”, so the exploration cannot avoi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inness”. Based on this, we take annotation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inness” of thick translation and find that incremental deficiency, incremental errors and incremental redundancy are three basic performances.

Key words: thick translation; thickess; thinness; memetics; annotations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胡业爽（1989—），女，山东济南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2019-11-19

[责任编辑：信 娜]